新闻与传播评论 JCR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第 77 卷 第 1 期 2024 年 1 月
Vol. 77 No. 1 Jan. 2024. 071-081

DOI:10. 14086/j. cnki. xwycbpl. 2024. 01. 006

乡村广播的情感治理:可能空间、运行逻辑与社会实践

罗宜虹　陈　帆

摘要:情感主义的治理逻辑能够弥补制度主义、技术主义的治理逻辑带来的制度和效率至上、人本位思想旁落的缺憾,是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回应。研究通过农村实地调研,对乡村广播情感治理的历史逻辑、社会逻辑、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分析与解释,发现当前重新活跃在乡村地区的乡村广播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形式和节奏,能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情感力量,深化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柔化治理结构的"刚硬"形象,提升村民对治理权力的认同,能促进协商交换,达成互惠互利,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但由于情感的个体化、精细化的特性,以及乡村社会媒介格局的剧烈变革,情感治理也将面临情感的"异化"与对情感的过分倚重等挑战。

关键词:情感治理;乡村广播;互动仪式;情感社会结构;情感交换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1-007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XWO39)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思想新理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正式进入国家话语体系。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又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内核是人的主观体验,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共同情感。二十大报告更清晰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无论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还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都呼唤情感治理的回归。情感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举措,它利于柔化国家刚性的治理体制,增强社会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张力。

理性治理手段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主导治理方式,带来了高效、合理和稳定,促进社会的平稳运行;但与此同时,理性治理带来的严密的科层制和官僚作风挤压了社会结构的伸缩空间,社会治理的"麦当劳化"属性日益凸显。[1]现代社会生活中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出现冲突,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忽视,甚至出现信任缺失、社会关系异化、乡村与国家联系断裂等风险。而情感治理可以起到弥合政治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分裂,平衡治理效果和主观体验等作用[2],彰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回应人本思想的召唤。

乡村广播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扎根于乡村。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挤压了广播在乡村地区的生存空间,但近年来广播又以"村村响"应急广播和疫情期间配合乡村地区疫情防控的形式"卷土重来"。除了发挥传播应急和疫情防控信息的功能,广播在乡村振兴中还凸显情感治理的政治属性,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连接乡村社会与国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农村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突显乡村广播的情感治理功能既符合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又能切实做到服务农民群众,建立并密切乡村与国家二者的联系。本文从这个视角出发,关注以下问题:①乡村广播为什么适合乡村;②乡村广播开展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③乡村广播在新时代有何新意涵,并对乡村广播开展情感治理做出现代性反思和展望,意在探析乡村广播的情感治理路径。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获取的资料,以回应乡村社会治理与媒介发展带来的诸多变化。

二、乡村广播情感治理的可能空间:理论和现实的考量

(一)情感治理内涵演变

对社会治理中情感因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彼时哲学家将情感视为一种夹杂着欲望的非理性因素。柏拉图认为个体只有驾驭“激情”和“欲望”这两匹马,才能过上节制和美好的生活[3],此处的“情感”与“欲望”已经具有情感意味的雏形。这种情感治理的范式被称为“自我技术范式”,强调情感和个体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和理性都是人类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4],驯服情感可以推动政治发展。这种治理范式被称为“国家技术范式”,强调情感和政治的联系,统治者运用情感策略为政治服务。

国内虽没有直接提出“情感治理”这一概念,但将“情感”作为治理方式的理念却贯穿了整个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情感治理在中国拥有深刻的文化基因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儒家的天下观将人心视为形成人类共识的路径,而情感在连接人与人、天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起重要作用[5],体现了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地位。情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维度,情感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利于维护治理框架[6],而且情感在政治系统中不仅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更是直接落实到政治实践的制度体系[7],奠定了政治制度人文关怀的基调。现代治理实践中也经常出现情感治理的身影,基层开展的“送温暖”“驻村帮扶”等活动也显现出基层治理实践中嵌入的情感因素,情感因素在连接基层与国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推动作用。[8-9]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都隐现着情感治理的逻辑,突出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但中国的情感治理不同于西方的情感转向,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而且内涵更为丰富,即其不仅将情感作为治理手段,还将情感作为治理的对象和内容。研究中讨论的情感治理,指的是在基层的社会治理中所运用的一整套既以情感为治理对象,也以情感为治理手段的柔性治理技艺,目的在于用情感的柔性层面解决基层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积极回应公众的情感需求,通过营造情感氛围,加强互动沟通,推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化,促进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谐,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目标的达成。[9]

(二)声音政治的再现:广播参与乡村发展

乡村广播与我国基层治理紧密相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推动“广播下乡”,通过广播将农民群体整合进国家的政治议程中。[10]聚焦于特定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广播的发展变化隐含着政治逻辑。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农村广播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共产党利用广播培育农民群体的国家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完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政治联系。[11]70 年代之后,媒介技术不断进步,农民群体接收信息的渠道也逐渐多元化。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村广播更是从“国家象征”沦为“广告载体”,这一发展演变也展现出乡村政治、经济在商品经济影响下发生结构性转型的逻辑。[12-13]

中国的乡村广播具有多元化、当地化和非体制化的特点,是典型的参与式广播,它适合“大分散、小集中”的乡村地区[14],在促进政治传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还有助于解决城市中心主义的信息供给模式与实际信息需求错位的矛盾[15]。虽然目前农村广播的生存状况受新媒体环境影响而岌岌可危,但乡村广播在助力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方面仍然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优势,它可以通过与新媒体合作等多种方式继续助力乡村振兴。[16]

2012 年之后,乡村广播出现复苏趋势,所以 2012 年至今被称为乡村广播的“积极回归”时期。[17]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乡村广播因“硬核”喊话“出圈”,它搭建的“国家在场”的仪式场域显现出明显且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在疫情肆虐、人心惶惶的时刻起到了凝聚人心、拉近乡村与国家的距离的作用。[18-19]

(三)乡村治理中的广播媒介:隐藏的情感维度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分别在湖北省京山县新市镇,咸宁市通山县大畈镇,武汉市刘集村、陈田村和张家榨村进行的实地调查,但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对农民培训的参与式观察。① 访谈时间集中在 2020 年 5—6 月、2021 年 6—7 月、2022 年的 7—8 月期间;访谈形式为面对面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结合的形式;访谈地点分别在郊区各镇的成人学校教室、村委会;访谈资料为录音笔记录、文本整理的形式。其中 2021 年访谈 5 个镇,人数为 23 人;2022 年访谈 3 个镇,人数为 15 人;2022 年访谈 4 个镇,人数为 10 人。

通过对这些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研究认为:媒介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扩散与城市中的扩散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尽管社交媒体的出现给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参与平台,但广播仍是显性角色,在乡镇之间、村落内部的行政治理中,广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乡村广播以本土文化为基础,深化自我关联性情感

初级群体是最早出现的社群类型,具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等特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便是典型的初级群体。[20]每个社区的传播结构都是独特的[21],相应的,乡村的传播系统也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独特的传播结构。乡村广播作为乡村传播系统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也表现出显著的本土特色,衍生出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传播机制。

首先,广播的空间偏向和收发门槛低契合乡村相对封闭性和整体文化水平低的特点。乡村的相对封闭性是指村民的流动范围大多仅限于本村,村与村之间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广播是一种空间偏向的媒介,对距离的限制适用于人员流动性不强的乡村社会,农民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田间劳作都可接收广播内容。广播无差别对待所有接收者,对受众不设文化素质要求,所以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农民也可无障碍接收。

> 我们农村人大多都没有很高的文化,很多我这样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根本不认识字。但是只要耳朵不聋,都能听见广播,就像去年我们村广播通知我们去镇上打疫苗,我就听到后赶紧回家跟我儿子说,当天我们一家人就去打了疫苗。②

其次,乡村广播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低,播报程序简单、易操作。广播不仅建设成本低、运行耗费电量少,而且设备的使用年限长,性价比极高,经费有限的村级单位能够负担起乡村广播的建设、维修、运营等成本。乡村广播的操作程序简单,对播者的要求极低,使用者只需经过简单的培训即可进行播报,其时空伴随性的特点还可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召集村民,是乡村社会的适宜性媒介。

乡村广播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传播机制,实质上是对作为乡村主体的“人”的重视,这是实现情感治理的应有之义。在此过程中,村民可以感知广播媒介主动向本土社会传统和文化习惯靠拢的倾向,从而加深与广播媒介的关联性情感,提升对广播媒介的认同感。

2. 作为共同记忆的载体,实现情境性情感的再生产

广播扎根中国乡村已有 70 多年,深度参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为农民群众提供娱乐,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重塑时间观念和“同时性”想象。[22]“实用”是乡村广播固有的媒介特性,它通过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为村民提供便利性服务,全方面、多层次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生活。虽然目前乡村

---

①从 2017 年开始,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暑期实践团队开展“湖北省智慧农村”的调研与针对农民媒介素养提升的培训。笔者参加了每年的农民授课培训,授课期间进行了访谈。之所以选择以上村镇,是因为他们涵盖了现代乡村最主要的三种发展形态,具有代表性。例如,刘集村以农业种植为主,属于传统农业型乡村;新市镇、大畈镇和张家榨村大力发展工业和旅游业,属于走现代化发展路线的新型经济乡村;陈田村依附于种植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是从农业型乡村向新经济型乡村跨越的过渡型乡村。

②访谈地点:陈田村;受访人员:村民 LMD;访谈时间:2022 年 7 月 15 日。

广播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但它的单一性、主动性、及时性、广泛性等特征是其他任何媒介甚至是互联网都无法取代的[23],它仍是乡村地区不可替代的服务型媒介。除了明显的生活服务功能,乡村广播的文化娱乐功能也十分凸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节目是有线广播的重要节目内容,逐渐形成教育性、知识性、服务性和欣赏性四种性质的节目。[24]改革开放之后,流行歌曲在内地发展得如火如荼,乡村广播跟上时代潮流播放流行歌曲,以听觉的文化表达培育了乡村社会初始的文化氛围,同时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欣赏水平。乡村广播承载了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共同回忆,因此它更容易在与村民的日常互动交往中激起村民的情感共鸣,增进村民的认同和同理心,最终实现情境性情感的再生产。

大畈镇的广播前身为屋顶喇叭,屋顶喇叭即家家户户门前安装一个小喇叭以接收村里喇叭总部播送的内容,播送内容主要为戏曲和天气预报。

> 当时也没手机电视,没什么娱乐的,那时候喇叭经常放《站花墙》《雪山放羊》《鲍秀英招亲》等戏曲,我们可喜欢听了!①

> 我们农民种庄稼就是靠天吃饭,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都得由天气决定,所以当时的天气预报可帮了我们大忙了。②

如今的乡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治理制度、文化风貌、乡土人情、自然景观都随着历史的车轮发生了改变,而乡村广播却成为“变化的乡村”中的“不变”,它见证了乡村的历史性变革,承载了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村民在潜移默化中习惯了乡村广播这一媒介的存在,习惯的不仅仅是广播发挥的实际功用,更是其作为共同文化记忆的载体。

3. 乡村广播在政治传播中积极发挥情感作用,优化结构性情感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入乡村的广播就注重用情感参与的方式与社会产生互动,在“机制层面”有机融入乡村社会治理进程。[22]疫情期间,乡村广播营造“国家在场”仪式,在危难时刻凝聚人心,拉近了乡村与国家的距离。[19]此外,乡村广播在应急治理和提供文化娱乐的过程中采用巧妙的话语策略将情感融入其中,实现了以情治理。[25]

> 我们村通知我们开会,一般都是先用广播通知。他通知的时候是用我们的方言广播的,因为我们村里老年人多,文化水平不高,听普通话不如听方言方便。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用那种录好的普通话通知我们,后来我们就向村委反映,说我们听不惯普通话的通知,所以现在广播通知什么事情就用方言了,这就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广播还是挺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有人情味。③

重回现代社会的乡村广播之所以能在疫情防控、应急广播、提供文化娱乐、支持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关键原因之一是其携带的情感因素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弹性,大大降低了开展工作的难度。与此同时,饱含情感意味的乡村广播也促进了结构性情感的再生产。结构性情感与情境性情感相对,它将基层治理视为国家治理在社会的延伸,它的产生是自上而下的。乡村广播因带有温度的治理方式使得它更易被村民接受,因此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它的行政功能也能得到更好发挥,此过程中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进而增加对国家的信任与尊重,优化了结构性情感的再生产过程,为乡村治理奠定了积极的情感基调。

4. 乡村广播有助于化解乡村内部的消极情感,促进关系协调

全球治理委员将“治理”界定为各种个人和机构(公共的或私人的)管理、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它通过持续的联合行动来调和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26],突出了“关系”在治理维度中的地位。因此乡村治理也不能跳脱“关系”层面,建立关系协调的积极社群更是乡村治理追求的重要目标。

---

①访谈地点:大畈镇;受访人员:村民 LMY;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8 日。
②访谈地点:大畈镇;受访人员:村民 CHS;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10 日。
③访谈地点:张家榨村;受访人员:村民 ZLM;访谈时间:2022 年 7 月 19 日。

乡村社会受“权威主义文化”影响深远,尽管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其影响逐渐弱化[27],但权威主义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乡村广播经常化身为政策传递者,政治属性凸显,是基层治理权力和国家在场的表征,农民对国家权威的敬畏和崇拜便具化为对乡村广播的信任。在信息爆炸的后真相时代,村民们身处信息的洪流却难以辨别真假,越来越陷入“信息孤岛”,此背景下的乡村广播成为引导村民正确认知信息的“外显技术”[28],减轻了村民因无法辨别信息真假而产生的迷茫、挫败感等消极情感。除此之外,现代乡村经历多方面的变革,利益分化、信任缺失、矛盾突出等问题日益浮现,造成乡村内部积聚消极情感,而乡村广播的权威性特征使得它处理问题的方式被村民认可,解决问题的阻力小,从而缓解乡村社会滋生的消极情感。

> 现在人最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谁也不相信谁了,只相信钱,前些年我们村南边的地租给外边来的老板了,很多人不满意自己家的地价,觉得凭什么我们家的地没有他家的地贵,村里那段时间很多家都闹得不愉快,然后我们村广播就说了为啥地的租金不一样,是按什么标准给的租金。因为是村广播说的,比较有威信,大家知道之后也就接受了,不愉快啥的也都慢慢好了。①

乡村广播媒介的“在场”能有效整合乡村的社会秩序,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有效监督”,并且树立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意见领袖”形象,促进了乡村内生性力量向治理资源的转换,推动了村民参与式治理的进程。

三、乡村广播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

乡村广播体现的情感表达既是对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也是对人本位思想的回归。研究基于互动仪式理论、情感交换理论、情感结构理论,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探讨乡村广播如何连接起乡村社会与国家,分析乡村广播开展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

(一)历史逻辑:社会转型、时代特点,塑造情感表达形式

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追溯情感治理的历史逻辑,是描绘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自身独有的情感形式和节奏。社会情感是伴随着社会结构而发展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也会随之带来社会情感的变化和转型。[29]

中国是典型的情理社会,情感治理模式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治理维度中,乡村社会更是如此。早在传统社会时期,中国就滋生了情感社会的土壤:儒家提倡仁、义,仁和义在日常伦理的生活中的实践要求为“事亲”“从兄”,情感要求为“亲亲”“尊尊”,最终的归宿皆为人情[8],折射出儒家对人情关系的重视。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三种主要的关系类型:血缘亲密关系、乡土地缘关系和宗教崇拜关系也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30]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就注重调动情感因素的力量,在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和符号体系等方面运用情感治理模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条件艰苦、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31]

广播是农村开展情感治理的重要媒介,我国的乡村广播记忆起始于20世纪。1949—1956年,我国乡村广播建设开始起步,1950年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明确指出广播的主要作用是宣传和动员,彰显了服务农民群众、凝聚民心的初衷,具有浓厚的情感治理意涵。

渡过起步阶段之后,乡村广播快速走向繁荣时期。1957—1977年,乡村广播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该时期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乡村的广播建设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高指标的倾向,因此这一时期乡村大喇叭数量激增。此时乡村大喇叭在党群联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农村进行素质教育、卫生宣传、精神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其情感治理的内涵。

经历高潮之后,乡村广播的发展热潮逐渐降温,1978年乡村广播开始走向衰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迈进,广播事业也进入了改革调整期。另外,此时期电视网络建设已经展开,音画双渠道的电视逐渐取代了单一声音渠道的广播。到了1986年,电视人口的覆盖率已经超越了广播,90年代

①访谈地点:新市村;受访人员:村民ZQX;访谈时间:2020年5月10日。

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录音机、录像机、手机等新媒介,广播的吸引力大大下降,但是并没有因此退出乡村社会,而是持续秉持情感治理传统,发挥组织、协调等基层治理功能,推动乡村治理。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该时期乡村广播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

自 2012 年开始,乡村广播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喇叭重返历史舞台,帮助解决乡村地区的信息接收和治理问题,为补齐“三农”的短板提供了有益的帮助。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大喇叭持续把握情感脉络,将情感治理的方式贯彻到新时代的乡村社会生活中,助力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乡村广播通过各种“土味喊话”“硬核劝阻”,充分发挥情感治理功能,为阻击疫情做出了突出贡献。乡村广播蕴含的情感治理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它伴随和见证了中国乡村 70 载的发展历史,已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社会逻辑:共同行动、增强团结,维护社会秩序

情感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构成了情感的社会运行逻辑。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2]在马克思看来,情感是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归属于意识形态,也是反映一定经济结构和阶级利益等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社会结构是由人构成的,在主体间交往中蕴含着情感因素。情感不仅是社会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推动社会运转的内在动力,更是维系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涂尔干认为,情感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情感和信仰是构成社会共同意识和生活体系的要素,乔纳森·特纳更是将情感视为“维持或改变社会现实的能量”。情感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实践,但可以通过引导的方式推动社会实践,促进社会良性运转。情感也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理性治理手段来维护,也需要情感上的维系,需要情感来润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调和不同治理方式的矛盾。柯林斯在涂尔干和戈夫曼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互动仪式理论,阐述了人们通过共同行动、定势性礼仪、暂时情绪激活“共同在场、与局外人的边界、交互的注意力集中和共享情感”这些仪式成分,然后通过“集体兴奋”产生仪式效果:群体团结、增强的情感能量、标记社会关系的符号与违反对符号的尊重所产生的正义的愤怒,如图 1 所示。简而言之就是参与者通过互动的同节奏活动和实时反应唤醒情绪,情绪符号化后又进而强化情绪。[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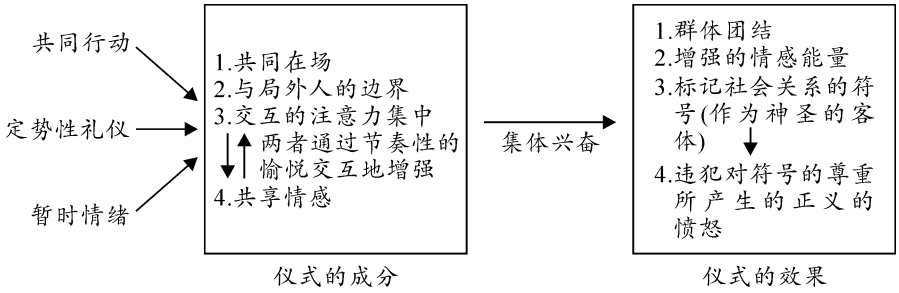

图 1　柯林斯互动仪式的一般模型

2012 年刘集村大力整修村内基础建设,如修路、挖沟渠、修建居民休闲设施等。在村民参与修路和挖沟渠等集体劳动活动中,乡村广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饱含情感广播喊话等形式号召村民参与劳动,激活仪式成分,构建互动仪式场域。

> 当时我们村广播说,修路、挖沟渠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以后走路、给庄稼地排水、浇水方便,等这些修好了,不但方便我们这一代人,也方便以后的孩子们,这是个大好事,谁参与谁光荣。后来干活的时候,几乎每家都出了一两个人去干活。①

①访谈地点:刘集村;受访人员:村民 LML;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22 日。

仪式的成分包括:共同在场——村民的共同在场,与局外人的边界——刘集村村民的身份,交互的注意力集中——修路、挖沟渠工作的进度,共享情感——集体劳动和期待建成后给乡村带来便利的愉悦。乡村广播的号召使得刘集村村民共同参与劳动、共同关注集体劳动工作的进度、共享同一份愉悦等几种条件同时成立,为村民参加集体劳动的互动仪式提供启动条件,间接作用于互动仪式的结果。仪式的结果包括:增进群体团结,广播对集体劳动号召加深了村民对刘集村的认同和归属;增强的情感能量,对先进劳动者的宣传与赞美使村民获得了个体的骄傲和劳动愉悦;标记社会关系的符号,村委成员带头劳动的作用通过广播即时宣传,成为村里的符号性人物;而对不参与集体劳动或工作偷懒的村民的谴责,体现了违反对符号的尊重所产生的正义的愤怒。

乡村广播充分调动了乡村社会的情感力量,它积极参与、组织、协调乡村社会集体活动,推动乡村地区开展互动仪式,深化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在整合人际关系、凝聚乡村信任、维系乡村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乡村广播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的情感作用,不仅高效地推动社会运转,还有力地拉近了乡村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夯实了乡村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

(三)政治逻辑:柔化结构、关系重建,再造乡村治理权威

情感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强烈的价值色彩。政治制度对人的情感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情感并不只是个体体验,情感也具有政治性,任何政治运动都包含着人们的情感表达。[34]区别于西方的契约国家想象,中国的老百姓对国家注入更多的情感与道德认知。这就能够理解中国的治理不仅要基于理性的法律与制度保障,而且更应该给予老百姓更多来自国家的关心和关怀。[35]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视情感因素的力量,注重以情感的方式获取民众的支持,形成了著名的群众路线。国家的治理话语体系曾多次提及“民心”等词汇,也足以证明情感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情感也是人民群众对国家形象的感知方式,人民群众习惯于基于情感与道德来感知国家形象,如我国在治理实践实施的“精准扶贫”“农村危房改造”等民心工程,这些民心工程不仅是国家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帮扶,更承载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情感关怀。[36]

乡村广播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在日常播报活动融入了情感因素,推动情感治理嵌入基层的治理框架中,并参与塑造乡村社会的政治空间。在情感社会学中,情感结构理论将情感引入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中,认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影响着情感唤醒的强度,同时“期望”也被认为是唤醒情感的重要动力之一: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越高,人们对他的期望也越高,而且以往的互动经验也是形成未来互动期望的重要基础。[33]乡村广播是国家治理权力的表征和延伸,承载着独特的权威意义,因此在乡村的政治生活和情感结构中均处于高位,对村民的情感进程影响较大,而且被村民赋予高期待的价值预设。

张家榨村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时村内人心惶惶。乡村广播及时介入,将防疫政策和防疫措施及时告知村民,安抚村民情绪,有效地遏制了谣言,为恐慌无助的村民打了强心针。张家榨乡村广播在疫情期间的播报不仅有效地协助疫情管控的实质性工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广播背后隐含的国家和政府对村民的情感关怀,影响了村民个体的情感进程,抑制了村内恐慌情绪的滋长,增强村民打赢抗击疫情保卫战的决心和信心,也拉近了村民与政府、国家的心理距离。治理结构的“刚硬”形象得到柔化,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也增添了关怀的意味,同时也巩固、提升了基层的治理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村民对治理权力的认同,为后续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稳固的群众基础。

> 当时疫情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听说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已经有很多人被传染了,我们村又离武汉市区这么近,所以很害怕疫情传染到我们这儿,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防治。那个时候我们村的广播可发挥了大作用,广播说了一些不让出门之类的事情,又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有什么事给他们(村委)打电话,他们都管。听完之后就感觉国家和政府在管着我们的安全哩,也就没那么害怕了。①

①访谈地点:张家榨村;受访人员:村民 ZQX;访谈时间:2022 年 7 月 20 日。

村干部也表示乡村广播提升了他们的治理权威：

> 通过疫情期间的广播，我发现村民更加配合我们的工作了，之前开展工作的时候村民们配合的积极性不高，现在我们通知个什么事，比如通知大家打疫苗，大部分村民都很快去打，我们的工作开展的顺利多了。①

促进关系和谐是治理含义中的关键向度。只有在较为协调的关系环境中，协商议事、民众参与才能成为可能，各项村事务才能得以理顺，进而治理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四）经济逻辑：协商交换，互惠互利，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基层治理遵循的主要是“经济逻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定位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城乡基层治理领域，社会管理主体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转变其治理方式，广泛形成了以提升绩效为目标的经营性治理局面。[37]情感虽属于意识层面，但也具有经济属性，它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产生影响。研究借助情感社会学理论的情感交换理论解释情感如何作为一种驱动力，作用于公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情感交换理论深受经济学影响，其将“交换”概念引入并作为核心理念：它把情感的互动看作交易，认为互动即资源给予和获得的过程，参与者期待从交往情境中获得情感，并且这种期待是建立在自己付出的代价和以往的经验基础上。当以较少的付出获得期望的收益时将体验积极情感，反之，将体会到消极情感。[33]情感交换理论学派中的爱德华·J. 劳勒将交换关系分成四种基本模式，分别是生成交换、协商交换、互惠交换和普及交换，如表 1。劳勒将这四种交换模型分为生成的、直接的和非直接的三种类型，并认为这三种类型的交换结构会唤醒不同程度的整体感受、共同责任知觉和情感强度。[33]

表 1　四种基本模式的交换关系

交换模式（属性）	交换结构	整体感受、共同责任知觉	情感强度
生成交换	生成	高	高
协商交换	直接	中	中
互惠交换			低
普及交换	非直接	低	次低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铺开，市场力量更多进入乡村社会，一些地区的乡村广播也顺应时代的发展拓展功能，增加经济功能，陈田村正是如此。陈田村位于武汉市新洲区，耕地多为山坡地形，每户所属耕地面积较小，单户开展种植和收获成本较大，近年来多数农户放弃种植耕地。为了解决土地闲置问题，村委积极充当中介，为有意愿在此开展茶叶种植的开发商与农户之间架起沟通、商议的桥梁，同时鼓励农户种植茶叶。据陈田村村委介绍，他们主要是通过广播和微信给农户传递土地租赁政策、市场行情、茶叶种植技术、相关补贴政策等信息，再广播号召开会，收集农户的意见。陈田村广播传播经济信息、组织经济活动的行为体现了“情感交换理论”的生成交换：经由广播，村民共同参与土地租赁和种植茶叶的社会经济活动，在此过程中进行信息交换、意见沟通、合作互助，进而产生情感的交换模式。最终经过多次沟通，本村的全部耕地都被有效利用，实现土地经济效益最大化。

情感交换会带来积极情感，提升愉悦度，促进公众的凝聚与行为的产生。陈田村借助广播媒介不但实现了农户增收、优化了乡村经济模式，还密切了村民情感联系，收获了村民对基层治理权力信任的情感效益。

①访谈地点：张家榨村；受访人员：村委成员 CWJ；访谈时间：2022 年 7 月 21 日。

四、总结与思考:乡村广播情感治理的现代性反思与未来展望

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现代社会治理呼吁创新,情感治理正是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回应。情感治理注重用情感因素化解矛盾,培育情感共同体,它带来的情感认同所具备的合法性价值甚至超过法律赋予的合法性。[38]乡村广播是乡村地区开展情感治理的有效媒介,它具备历史传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有其运行的价值,在重构乡村社会的情感共同体、增加社会情感资本存量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家层面呼唤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乡村广播将其浓烈的情感意味注入治理方式中,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乡村广播在新时代下继续保持原有传播优势,通过提供"定制化"政策信息和其他便民信息服务村民,同时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在疫情防控、传播应急信息、脱贫攻坚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显著作用。[39]乡村广播是国家治理权力的"化身",其与乡村居民的互动实质上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村民在乡村广播的传播活动中触摸到具象的国家,广播建构的"同时性"和"公共性"想象也将村民纳入"国家的普遍性"中来,从而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归属和认同关系,加固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观。

其次,乡村广播与互联网新媒介的高低技术组合完善了乡村的媒介系统。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代旧媒介,新媒介是在弥补旧媒介缺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尽管互联网在时效性、灵活性、交互性、信息量、传播范围等方面都更胜一筹,但毋庸置疑的是广播在乡村依旧有其不可动撼的地位,其以"人"为媒介、内容生产草根化、伴随性、技术和经济成本低等特点,在乡村地区更具有"适宜性"。乡村广播作为"旧媒介",与现代互联网媒介技术相互配合,符合乡村信息公共服务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旨,能更好实现公共信息全员覆盖,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高技术与低技术组合的媒介也丰富了乡村信息传播媒介,完善了乡村媒介系统,提升了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现代性和科学性。

最后,乡村广播有助于重塑农民自我认同,构建情感共同体。我国农村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社群主义的主张,对集体、国家的依赖性较大,受市场经济影响,现代乡村主体利益逐渐分化,农民原子化、个体化现象较为明显。自由主义的转向使得农民难以适应,农民在情感转向的过程中易陷入自我迷失的状态。查尔斯·泰勒认为,人只有处在一定的社会与文化框架下才能深刻地理解与认识自我,而与他人的互动、交流关系是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关键。[40]乡村广播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特点,不仅为村民提供共同讨论的话题和契机,促进村民交流互动,更能通过乡音土语、熟人效应消弭疏离感,村民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自我理解与认同,重塑自我身份,创建情感共同体,增强乡村凝聚力。

利用乡村广播开展情感治理有诸多益处,但需要把握情感治理的尺度。由"私情"转向"公情"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如何在控制私情的基础上在社会治理中投入感情,仍缺乏明确的行动指导,但确定的是单向度的情感治理绝不是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良药。情感治理在现代治理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如情感"异化",可能会将情感服务机械化、表面化,偏离真正的情感服务;也可能因过于重视情感而导致规则作用弱化、办事效率低下。所以,不能将情感治理的逻辑取代工具主义的理性治理,情感治理不是理性治理的对立面,相反,两者是一对具有极强互补意义的治理方式组合。此外,道德教育也对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广播在发挥情感治理功用时也应重视德治和法治力量,建构科学的治理矩阵,以维系社会治理的动态平衡,提升基层治理水准。村干部作为乡村情感治理的施为方和广播的管理者,既需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情感治理的重要意义,又要从日常广播播报中遵循情感治理的实践,不仅关注情感治理的功能性作用,还要更加重视情感本身的意义,将价值理性融入日常治理实践中。[41]广播自身的情感治理属性已十分显著,为了避免情感治理成为束缚乡村广播治理方式多元发展的枷锁,因此基层治理要摒弃单纯"情感绩效"的思维,要给予村干部

选择治理方式的自由,允许他们在广播实践中摸索经验,根据乡村社会实际情况把握广播的治理属性及运用尺度,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乡村广播虽是适宜乡村地区的媒介,但以手机、电脑为代表的互联网媒介也逐渐显现出其技术优势,成为乡村社会和基层治理的新晋得力助手,促进了乡村社会媒介格局的剧烈变革。因此乡村治理媒介应积极整合乡村广播与新媒介资源,以包容的姿态吸纳不同的媒介优势,促进情感治理朝更加个体化、精细化、高效率的现代型情感治理转型,合力营造有温度的乡村公共空间。但是如何平衡新旧媒介参与基层情感治理的比例和路径,使其共同推动基层治理发展,仍是未来需探索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 乔治·瑞泽尔. 汉堡统治世界:社会的麦当劳化. 姚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8-52.

[2] 吴晓凯. 当代社会情感治理的逻辑演绎与实践反思. 宁夏社会科学,2022,2:152-160.

[3]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68.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2.

[5] 干春松. "感"与人类共识的形成——儒家天下观视野下的"人类理解论". 哲学研究,2018,12:50-59+125.

[6] 张树平.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定情感与结构主体——以"贾谊悲剧"为例. 东南学术,2020,5:167-184+248.

[7] 王向民.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学海,2019,4:55-63.

[8] 王雨磊. 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 中国行政管理,2018,5:96-101.

[9] 向德平,向凯. 情感治理:驻村帮扶如何连接国家与社会.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84-93.

[10] 潘祥辉. "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 70 年. 浙江学刊,2019,6:4-13.

[11] 赵艳娟. 十八大以来"大喇叭"与党的农村宣传工作研究.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2022-11-20]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 dbname=CMFD202202&filename=1022555612.nh.

[12] 王华. 农村"高音喇叭"的权力隐喻.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31-38.

[13] 何均力.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2018,4:2-16.

[14] 韩鸿. 参与式传播对中国乡村广播发展的启示——基于四川古蔺县桂香村"夫妻广播"的调查. 当代传播,2009,2:93-95.

[15] 张雪霖. 媒介融合背景下乡村"大喇叭"的重建及其机制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2:87-97.

[16] 吴卫华. 农村公共广播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7:103-105.

[17] 李星萱. 乡村大喇叭疏解乡村治理困境之路径探寻. 新闻文化建设,2020,6:102-104.

[18] 冯帆,王安祺. 基层广播: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动员利器. 青年记者,2020,27:77-78.

[19] 秦修琪,林燕. 乡村广播在抗疫战中的传播效力. 青年记者,2020,23:82-83.

[20] 陈洪友. 从差序格局到新媒介框架——我国乡村传播结构转型的考察. 编辑之友,2020,9:43-48.

[21] 张咏华. 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建构——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2:11-16+94-95.

[22] 沙垚,张思宇. 作为"新媒体"的农村广播:社会治理与群众路线. 国际新闻界,2021,1:120-137.

[23] 柴志明,林勇毅,徐洲赤等. 浙江农村广播 60 年:现状与思考.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10:16-18.

[24] 朱沁远. 有线文艺广播与乡村文化改造(1952—1966). 南昌:南昌航空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022-11-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 dbcode = CMFD&dbname = CMFD201601&filename = 1016704328.nh&uniplatform = NZKPT&v = awxBvsvvJq0NRWbAUbf8-o1j0RkITZ55IIH69ofkrtXEoooFI7bkmu9g8JoRHgdC.

[25] 张劲松. 回归的农村大喇叭——一座皖西村落 2020 庚子年的传播记述. 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2022-11-20]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 dbcode = CMFD&dbname = CMFD202201&filename = 1021636134.nh&uniplatform = NZKPT&v = kX4Uqo1MAVSnF8ltWA3lD6A7Q2RoLeiFMXxsQAnr5FCg469-caDfoDjm-rEo8Kncg.

[26] 杨雪冬,王浩. 全球治理.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44-145.

[27] 马庆钰. 论家长本位与"权威主义人格"——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5:53-58.

[28] 胡曜川. 村落技术治理进程中的乡土契合性研究——以华北白错村高音喇叭为例. 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21.[2022-11-20]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201&filename=1021094615.nh.
[29]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3:42-48.
[30] 汪勇,周延东.情感治理:枫桥经验的传统起源与现代应用.公安学研究,2018,3:1-23+123.
[31]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4:97-121.
[3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5.
[33]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8-69;147-176;177-213;171-173.
[34] 王丽萍.国家治理中的情感治理:价值、逻辑与实践.山东社会科学,2021,9:87-92.
[35]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10:117-132.
[36]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37] 范逢春.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行政论坛,2021,5:87-95.
[38] 朱志伟,孙菲.空间、结构与网络:社区情感治理的三重论域与实践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20,5:36-41.
[39] 孟伟,张帅.变革与新生:2021年中国广播发展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3:39-43.
[40]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4-56.
[41] 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28-36+169-170.

Emotional Governance of Rural Broadcasting: Internal Mechanism, Operational Logic and Social Practice

Luo Yihong(Hubei University)
Chen Fan(Wuh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emotionalism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logic, which leads to the supremacy of efficiency and the neglect of human centered thinking. It is a response to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field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logic, social logic, political logic, and economic logic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rural broadcasting was found that rural broadcasting, which is currently active again in rural areas, has unique forms and rhythm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t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ages, and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motional power of rural society, deepen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rural society, softening the rigid imag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enhancing villagers' recognition of governance power. It can promote negotiation and exchange,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provide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due to the individu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rural social media, emotional governance will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emotional alienation and excessive reliance on emotions.

Key words: emotional governance; rural broadcasting; interactive ritual theory; emo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emotional exchange theory

■**收稿日期**:2023-02-26
■**作者单位**:罗宜虹,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陈　帆,武汉工商学院文法学院、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